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綫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冲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他 江 東

把顛倒了的历史平頭倒過來

——周揚之流顛倒历史围攻魯迅
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綫罪行录

PDG

把顛倒了的历史 再顛倒过来

——周扬之流顛倒历史围攻魯迅
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綫罪行录

北师大^{革 委 会}_{井岡山公社}中文系大队《井岡铁騎》

1968·4·北京

出 版 說 明

这是一本資料长編，供学习革命伟人魯迅和批判反革命两面派周揚之用。书內引用了一部分內部資料，望勿公开引用。

本书經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社会印件办公室批准印行。介紹信为（68）印办介字第 965 号。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

“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泽东



橫肩冷對丈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魯迅

大蠱蔭下伏群魔，投一光輝露本相

——代 序

文化革命的伟大先驅魯迅在其逝世的前夕曾写过这样一段光輝的文字：

“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們彼此个人間事，无关大局，則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費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輝，可使伏在大蠱蔭下的群魔嘴臉毕現，試看今日上海小报之类，此种效驗，已极昭然，他們到底将在大家的眼前露出本相。”

这里所說的“群魔”，指的就是反革命两面派周揚、夏衍、田汉、阳翰笙之流。这里所說的“大蠱”，指的就是老牌机会主义分子王明及中国的赫魯晓夫刘少奇。而这里所說的“公开答复”，指的就是当时圍繞“两个口号”問題魯迅对周揚之流所展开的一場大論战。

一九三六年初，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揚积极追随老牌机会主义分子王明的右傾投降主义路綫，强行解散了“左联”，并拚凑起了一个“文艺家协会”，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一贩卖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投降主义口号。和“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相对立，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共产主义者魯迅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綫的立場上，据据毛主席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政策，正确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无产阶级的口号。

圍繞着“两个口号”的問題，在当时的文艺界展开了激烈的論爭。這場論爭正如魯迅所認識的那樣，絕非“彼此个人間

事，无关大局”，也不是孤立的現象，它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綫的一場生死搏斗，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圍繞着“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根本問題所进行的大論战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綫同以王明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綫两条路綫斗争，在文化战綫上的尖銳的反映。

被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文化新軍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的魯迅，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和两条路綫的生死厮杀，揮笔上陣，“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誘和殘害，他一点也不避鋒芒地，把鋼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恶的一切”。魯迅用他那支又泼辣、又幽默、又鋒利的笔，痛斥了周揚之流所推行的王明右傾机会主义投降路綫。尖銳地揭露了他們打着“所謂革命作家”的招牌，“其实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的反动本質，揭露了他們“噉噉喳喳，招是生非”的宗派主义的手段，揭露了他們两面派的“恶劣傾向”，揭露了他們借“联合战綫”之名，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宣傳卖国主义和叛徒哲学的罪行。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魯迅“簡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那支閃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輝的巨笔，早在三十年前就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揚及其一伙“伏在大蠱蔭下的群魔嘴脸”勾勒得絲絲入扣、丑态毕露！

对于三十年代文化战綫上的这场斗争，毛主席早已作了結論。但是，周揚却視此为他身上的“第二个癌症”，在此后三十多年来，千方百计地找寻一切机会，顛倒黑白，伪造历史，大举反攻倒算，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綫。特别是在建国以后，周揚投奔在中国的赫魯晓夫刘少奇的門下，成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綫在文艺方面的代理人，文艺黑綫的总

头目。这样，他們便更加肆无忌惮起来，明火执仗，赤膊上阵，一次又一次地颠倒历史，围攻鲁迅，把矛头直指我們的伟大領袖毛主席，明目张胆地为王明右傾投降主义路綫翻案，把左翼文艺运动的整个历史倒立了起来，把他們这一伙“群魔”、“鬼蜮”、“祖师爷”、“老头子”，統統打扮成了“正确路綫”的代表，“党”的化身。他們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历史颠倒过来了，就可以巩固其黑綫的专政了，就可以放手地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輿論准备了，就可以阴謀实现其反革命集团篡党、篡国的政治野心了。但是，好梦不长。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滾滾洪流，象是大海汹涌澎湃的怒涛，将周揚之流連同他們的主子一起席卷而去！

周揚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一貫用两面派手段隱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正象鲁迅所一針見血地刻划的那样：

“以我自己而論，总觉得縛了一条鉄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問自己的錯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說，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

这真是一幅“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話，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間、挑撥、分裂的勾当”的两面派嘴脸的絕妙写照！

白天是人，夜里是鬼；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是心非，两面三刀，这是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共同特点。忽而慷慨激昂，忽而轉弯抹角；翻手为云，复手为雨；躲躲閃閃，模棱两可；有利时赤膊上阵，反攻过去，不利时装死躺下，以伺时机，这是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慣常表演。周揚之流就是烂熟于这些反革命伎倆的。他們为了颠倒历史，围攻鲁迅，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或投以明枪，或射以暗箭，真可謂“机关算尽”，

但是，“他們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將其真象蔭蔽得十分徹底。”“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射下，周揚之流正象魯迅所早已預言的那樣，他們到底是在廣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廣大的革命人民眼前，露出了其卑鄙、凶惡的反革命本相！

一九三五年五月，魯迅在一封信中，針對着那些披着“左翼”外衣暗中陷害、打擊他的修正主義分子，曾經憤慨地寫道：

“上海所謂‘文學家’，真是不象樣子，……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萬字，把歷來所受的悶氣，都說出來，這其實也是留給將來的一點遺產。”

從這裡可以看出，魯迅那時是想對周揚之流進行一次聲勢浩大的回擊的。可惜魯迅沒有實現他的願望就逝世了。現在，周揚之流的反革命面目已大白天下，他們從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三十多年來顛倒歷史，圍攻魯迅，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滔天罪行已昭然若揭，被他們顛倒了的歷史由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無產階級司令部重新顛倒了過來，恢復了歷史的真面目，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把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一書，正是這樣一份揭露和清算周揚之流一貫顛倒歷史，圍攻魯迅，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滔天罪行的資料。由於我們水平有限，它編得還很粗略，有些地方還可能有錯誤，希望革命的同志們批評指正。

上 編

(1 9 3 0 — 1 9 4 9)

新
學
社
九
分

1.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

会上，鲁迅先生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演。他发出警告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因为，“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地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

鲁迅先生认为：“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战士”，而且，“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

2. 1930年6月后，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窃据了统治地位。李立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和充分准备，极力反对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英明政策，在6月11日，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立即武装起义，进攻城市的冒险计划，并实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

就在这时，李立三亲自去找鲁迅，企图用其“左”倾冒险主义影响鲁迅。

魯迅对“立三路綫”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而“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3. 1931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揚混入“左联”。

周揚原为上海大夏大学学生，1929年（大革命失败后）跑到日本，30年回国，在上海住在田汉处。31年混入“剧联”，又經“剧联”轉入“左联”。1932年初，重行混入党内，一入党，立即窃踞了“中央文委委员”的职务。

周揚混入“左联”后，用资产阶级的卑劣权术，网罗党羽，培植亲信，多方鑽营，32年批判“第三种人”后又窃踞了“左联”党团书记的职务，并主编《文学月报》。

4. 1931年7月20日，魯迅在社会科学研究会发表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对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綫影响下出现的“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的所谓“革命作家”、“革命文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魯迅說：“‘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續，好象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当环境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魯迅揭露这些“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說：“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他們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外面虽然好象突变，其实是并非突然的事”，“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因此，魯迅指出：“对于这些的

作品，我以为实在无须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作者也无须为了将来的名誉起见，自称为无产阶级作家的”。

5.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老机会主义分子王明窃据了党的中央领导岗位，大力推行一条比“李立三路线”更为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

三中全会后，王明到了上海，又把黑手伸进了文化界，曾数次参加“文总”及“文委”会议，大肆贩卖其“左”倾机会主义黑货，对当时进步文化团体起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对这条反动的机会主义路线，鲁迅始终坚持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而周扬却从他混入革命文艺队伍的第一天起，就紧跟王明，十分卖力地推行着一条从“左”倾冒险主义到右倾投降主义的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路线。

6. 1931年11月，周扬、夏衍一伙，炮制了“左联”《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进一步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这个决议，强调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却只字不提抗日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在文艺上，又一次提出所谓“文学的大众化”、“大众化的路线”、“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等等。同时，提倡苏联“拉普”的创作方法。

在决议中，强调“整饬纪律，严密组织”，推行王明的“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反动组织路线，把“左联”搞成一个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半政党”式的团体，打击和排斥以鲁迅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7 1932年，周扬在其主编的《文学月报》第四期上，

发表了大叛徒瞿秋白（署名芸生）^①的一首长诗《汉奸的供状》。这首诗表现了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錯誤倾向。鲁迅当时认为这种錯誤不仅芸生有，編者周揚也有这种严重的錯誤倾向，因此写了《辱罵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发表在《文学月报》一卷五、六合期上），对周揚之流进行了尖銳的批評。鲁迅指出：“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許多罵語去，好象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罵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这是“极不对的”。

8. 积极追随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綫的周揚，口头上表示接受鲁迅的批評，說什么“这是尊貴的指示，我們應該很深刻地来理解的”。实际上，他对鲁迅怀恨在心。1933年初，周揚指使刚被大叛徒瞿秋白拉入党內的田汉，化名首甲，糾集丘东平等人，联名发表了《对鲁迅先生的〈恐吓和辱罵决不是战斗〉有言》（署名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发表在《現代文化》第二期上），恶毒地攻击鲁迅。文章說鲁迅先生“帶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說鲁迅的批評是“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說法”，是“考茨基的和平革命論，戴白手套的革命論”。

对周揚之流的这种卑劣伎倆，鲁迅先生后来曾憤怒地說：“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罵我，他們还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錯者。我提出質問，但結果是模模糊糊，不得要领，我真好象見鬼，怕了。后来又遇到相象的事两回。”（《鲁迅书簡》809～810頁）

9. 1934年6月7日，鲁迅先生在《申报》《自由談》

^① 根据臧阜（阿英）：《关于瞿秋白的文学遺著》，《文汇报》1938年6月9日。后来，首甲等人公开信发表后，瞿又写了《鬼臉的辯护》一文，批評他們。完全是一幅反革命两面派的咀臉。

上发表《倒提》一文，署名公汗。7月3日，周扬的干将、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廖沫沙，化名林默，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論“花边文学”》一文，恶毒地攻击鲁迅为“买办”。文章說：“上海的洋行，有一种帮洋人經營生意的华人，通称叫‘买办’，……我想这一篇《倒提》的杰作，看他的口气，大抵不出于这般人为他們的东家而作的手笔。”

10. 1934年8月13日，魯迅在致曹聚仁的信中，对田汉、廖沫沙之流进行了一針見血的揭露：“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按：指攻击魯迅），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悅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經過敏，‘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一箭射来，我是明白来意的。”

11. 1934年8月，在《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了8月2日魯迅《答曹聚仁先生信》，对周扬一伙所热心宣傳的“大众化”、“大众語”的本質，进行了揭露。魯迅說：“关于大众語的問題，提出得真是长久了，我是沒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沒有开过口。但是現在的有些文章觉得不少是‘高論’，文章虽好，能說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問題却依然如故。”

12. 1934年8月31日，周扬的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化名紹伯，在《大晚报》《火炬》上以《調和》（讀〈社会月报〉八月号）为題，大罵魯迅，說魯迅“善于調和”：

“讀者試念念这一期的目录吧，第一位打开場鑼鼓的是魯迅先生，而在‘压軸子’的是《赤区归来記》作者楊邨人氏，就是健忘的讀者想也記得魯迅先生和楊邨人氏有过不小的一点‘原則上’的爭执吧。魯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楊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楊邨人氏打开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13. 1934年11月14日，魯迅在《答〈戏〉周刊編者的

信》中，对《戏》编者田汉给以回击。声明说：对于同一刊物上还有谁的文章，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同时，直接地对周扬、田汉之流的卑劣行径表示了充分地憎恶：“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14. 对于国民党在残酷军事“围剿”的同时，所进行的疯狂的文化“围剿”，鲁迅是一直注重实力、主张韧性的战斗的。但是积极奉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周扬却不然，他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情况下，却热衷于扩大组织，一味把新起的作家拉入“左联”。对此，鲁迅曾明确地表示反对。他说：队伍不在大，而在精。现在白色恐怖严重期间，即使有很好的新作家，也应该好好团结他们，但不要把他们拉进“左联”。否则，“左联”一旦被破坏时，就有连这些新起的作家也被一网打尽的危险。（引自×××交代材料：《关于左联两条路线斗争情况》）鲁迅这些正确的意见，既反对了周扬之流盲动冒险的“左”倾机会主义，又反对了他们“一味拉入”的右倾投降主义。

15. 1934年末，鲁迅在一次谈话中，对周扬一贯压抑、打击真正革命的作家而向资产阶级作家卑躬屈膝的极端恶劣的作法，给予了深刻的批判。鲁迅说，他们一贯是这样的：对于同人和新起的青年，总是打击，而对于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却客客气气，不进行批评。这使我想起：美国有一部电影，描写白人殖民主义者征服了非洲黑人之后，从黑人中挑选一些忠实的奴才，去管理黑奴。这些黑人的奴隶总管，每当白人主子来视察时，就对黑人同胞大施鞭打，对主子表功。周扬他们的做法，就是这种奴隶总管的做法。（引自×××交代材料：

《关于左联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

16. 周揚在窃取了“左联”领导权以后，他就和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勾結起来，分别把持了文学、电影、戏剧等方面的大权，和国民党文化特务、反动文人、叛徒托派互相配合，用尽了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放冷枪、射暗箭、造謠、誣陷、恫吓、搬弄是非、挑撥离間，疯狂地“围剿”鲁迅，使得鲁迅先生“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費力”。（《鲁迅书簡》695頁）

1934年12月10日，鲁迅在一封通信中指出：“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因为那时沒有現在似的压迫，所以有些人以为一經加入，就可以称为前进，而又并无大危险的，不料压迫来了，就逃走了一批。这还不算坏，有的竟至于反而卖消息去了。人少倒不要紧，只要質地好，而現在連这也做不到。”（《鲁迅书簡》780頁）

17. 1935年1月，在毛主席直接主持下，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扭轉了航向，撥正了船头。在全党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领导地位。

18. 周揚一伙，为了打击鲁迅，制造宗派，拉攏势力，大搞分裂活动，他們背着鲁迅印了左联内部刊物《文学生活》，秘密发行，并且在上边大罵鲁迅。对此，鲁迅十分恼怒，在1935年1月20日，致曹靖华的信中揭露說：“这里朋友（按：指周揚一伙）的行为，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出过一种刊物，将去年为止的我們的事情，听说批評得不值一錢，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給我看，而且不給看的还不止我一个。”又說：“我現在避开一点，且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再說。”